

試論港人仇富的兩個原因

今天談談港人仇富心理。有多少港人仇富，筆者不知道，亦未見過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所以在首句中的「港人」二字前面不冠量詞，並不是說香港人人如此。不過，上月底本月初，筆者與一些自由黨及商界朋友談天，彼此印證觀察和觀感，都同意仇富心態十多年來是嚴重了。對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而言，這是很壞的事，故有必要找出各種原因，以期能夠對症下藥。

傳統中國社會不仇富，主流思想當中，無論是儒、釋、道、法各家，都不以富為惡並以矛頭對準之。這不等於說國史裏頭沒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歷代農民運動，都反映「富者田連阡陌，貧無立錫」的客觀現實，中間自有仇富之心，但農民運動千百年來的基本意識都是「成王敗寇」、「取而代之」，革命無論成功失敗，事後的統治者多能減徵薄斂予民休息，仇富心態便歇。另一方面，自隋唐以來，中央政府以科舉取士，能在太平盛世保持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有效防止仇富思想高漲；史家錢穆對這點有深入論述。

香港情況，遠的不說，起碼自四九年起至七十年代末，仇富心理也不嚴重。內地解放前後，逃港百多萬大陸人，不少本來比較富裕（聯合國當年估計，此類來港難民佔七成），自然不會仇富，儘管來到之後，塊肉餘生，不少淪為無產者。至七十年代初，此四九年來港輩當中，已現明顯階級分化，一些人白手興家成為巨富，家傳戶曉成為傳奇人物受人羨慕不已，社會上，仇富之心未興，只存

在於一些傳統左派工農友會之中；無他，大家來到香港一窮二白，起點都差不多，過的都是苦日子，之後有些人成功，其他人只能寫個「服」字。

八十年代，中英為香港前途談判，港人「民主拒共」，無論貧富，命運都似一樣，大家感覺同坐一條船，仇富心理亦未萌生。但這一時期實際是一個隱蔽的轉捩點；其間，兩個因素逐步形成，發展出九十年代漸次普遍、其後日趨強烈的仇富心態。

這兩個因素，第一個是富豪第二代已經成長，八十年代起，紛紛開始接棒，一手統領家族生意，一手佔據社會重要公職。與這批富豪二代同時成長的其他四九年來港輩第二代，中間亦不乏靠己之力而成為中產中堅者；與二代富豪相比，這些人起點低、增值大，論能力並不輸蝕，故不同於他們的父母輩，心中不帶一個「服」字，甚或「尊稱」那些「七少」「物少」之時，還帶一點輕藐。二代富豪無神話。中產如此，中下及草根情況更甚；工業北移，香港經濟轉型，大批傳統工人失業而未能在其後「新經濟」中翻身，仇富心理已是呼之欲出。

與此同時，第二個因素亦出現。八十年代後，本地外籍富豪隨港英殖民統治勢力日落而退潮，以地產界華人富

豪為主的資產階級最後席捲全港經濟，於九十年代黃金歲月予取予攜，一面造就無數「無殼蝸牛」，種下與中產階級及低下階層之間的矛盾種子，一面成功累積與後殖民新權力（北京）之間的「合作」本錢。八十年代「民主拒共」陣線中的富豪一翼，

很快集體變身為九十年代中共戰部乃至中央級領導人的貴賓座上客。作為一個階級，這批富豪首先在過渡前的基本法談判中得到重要政治優待和制度保證，那主要便是十二個字：「功能組別」、「分組點票」、「行政主導」。有此十二字真言，再加上欽點的特首，他們的政經地位，就像港英治下的本地外國資產階級一樣穩固。筆者九十年代參與香港公職，其後任職政府，日與本地政經高層交往，親身目睹此發展全過程，感受十分深刻。資本家作為當年「民主拒共」最大受益者，一轉臉而成為本港政治民主化的最大阻力，無疑在經濟仇富之外，添加了政治仇富因素；換句話說，本來只集中在草根階層的經濟仇富意識，便因與中產、中上及知識分子這幾個階層當中的政治仇富意識匯合而大大增強。

千禧年之後，香港管治力量明顯向新資產階級傾斜，貧富懸殊狀況加劇，而資產階級中的惡勢力欲腐蝕囊括政府權力、削弱民主監督機制，通過如梁展文事件等在市民面前暴露無遺，更在在助長港人心中仇富情緒。這個趨勢，必因北京為求取在港廉價政治支持，對本地資產階級繼續籠絡姑息，在政改事上處處將就而加劇！